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20卷

21 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 (一)

学术指导：费孝通

主 编：马 戎 周 星

副 主 编：王铭铭 高丙中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一)/马戎,周星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4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 20 卷)

ISBN 7-301-04550-6

I . 21… II . ①马… ②周… III . 比较文化-研究-文集
IV . 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9517 号

书 名: 21 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一)

著作责任者: 马戎 周星 主编

责任编辑: 樊云竹 金娟萍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550-6/C·190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62549189

印刷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6.875 印张 42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学术指导：费孝通

主 任：马 戎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长江 马 戎 王铭铭 刘 能

刘世定 刘援朝 李建新 邱泽奇

周 星 赵旭东 赵 斌 高丙中

郭志刚 钱民辉 麻国庆 潘乃谷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书目

1.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

潘乃谷、马戎主编,邱泽奇、王铭铭执行主编,1996,天津人民出版社

2. 《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 周星、王铭铭主编,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

3. 《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

王铭铭著,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

4. 《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

王铭铭著,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

5. 《象征与社会》

王铭铭、潘忠党主编,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

6. 《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 高丙中主编,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

7. 《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

马戎、周星主编,潘乃谷、王铭铭执行主编,1998,群言出版社

8. 《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马戎编,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

9. 《汉族的民俗宗教》

渡边欣雄著,周星译,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

10. 《环境与社会》

[美]查尔斯·哈珀著,肖晨阳等译,1998,天津人民出版社

11. 《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

色音著,1998,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2. 《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 潘乃穆等编,199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3.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

马戎、龙山主编,1999,福建教育出版社

14. 《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

马戎、龙山主编,1999,福建教育出版社

15. 《中国乡镇组织变迁》(调查卷)

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1999,山西人民出版社

16. 《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卷)

马戎、刘世定主编,1999,山西人民出版社

17. 《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

乔健、李沛良、马戎主编,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

18. 《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 马戎、周星主编, 1999,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 《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

马戎、潘乃谷、周星主编, 200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 《21 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一)

马戎、周星主编, 王铭铭、高丙中副主编, 200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1. 《21 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二)

马戎、周星主编, 王铭铭、高丙中副主编, 2001, 北京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序言	(1)
读马林诺斯基《文化动态论》的体会	费孝通(1)
东亚与西方:对抗还是合作? ——论双方间的误会与曲解	王海(Thomas Heberer) (27)
亲属关系的重构	玛里琳·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 (65)
什么是人类学的启蒙? ——20 世纪的一些教训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88)
媒体参与的现代性:本世纪末的传播与当代生活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h) (120)
文化与社会结构	彼得·布劳(Peter M. Blau) (139)
普遍化,本土化,全球化:社会学和社会科学	帕沙·穆克季(Partha N. Mukherji) (153)
组织社会学的贡献	米歇尔·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 (186)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 (194)
亚洲的性别与发展	伊丽莎白·克罗尔(Elisabeth Croll) (199)
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和其他非市民领域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 (218)
从权力到识别:大众新闻与后现代性	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 (233)
英国的当代人类学中是否存在一种新物质性吗?	

- 大卫·帕金(David Parkin) (257)
- 中国人口迁移:过去和现在 王赓武 (273)
- 缘何“文化”? 缘何“生产”?
- 斯蒂芬·桑格瑞(Steven Sangren) (290)
- 克里斯玛理论和中国生活
- 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 (328)
- 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 金耀基 (350)
- 民族多元与多元文化 乔健(Chieu Chiao) (369)
- 作为藏族邻居的汉族与印度人的比较研究 中根千枝 (378)
- 全球化、现代化与文化多元性:分析香港中、西医药
- 体系的互动 李沛良 (384)
- 中国文明的民间文化基础 李亦园 (410)
- 华南的妇女与婚姻:以惠东为例之探讨 庄英章 (422)
- 日常世界与人类学 金光亿 (444)
- 从负面看中国人的婚姻 石瑞(Charles Stafford) (458)
- 表述就是社会事实——人类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 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 (479)

序 言

一

1998 年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在教育部、北京大学、费孝通学术基金、美国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于 6 月 15 日至 6 月 28 日期间举办了以“21 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讲座系列。在此之后,在 1995 年和 1997 年由我所先后主办的第一、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基础之上,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期间紧接着举办了相同主题的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

在为期 14 天的国际学术讲座系列上,来自中国(含港台地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的 25 位国际知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围绕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这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和具体选题作了十分精彩的讲演。六十余位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中青年学者与数千人次的听众一起倾听了这一系列的各次讲座,每次讲座都吸引了许多学科和不同单位的听众,讲演之后在讲演者和听众之间还有十分精彩和热烈的提问和讨论。在系列讲座结束之后,与会者在随后举办的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结合“文化自觉和跨文化对话”这个主题对讲座提出的有关学术热点问题再次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二

这次国际学术讲座系列以及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主题都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这个概念,首先是费孝通教授于 1997 年年初在北京大学校务咨询会和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来的。费孝通教授认为,在当前世纪转折的过程中,任何一所力求在社会变迁中做出贡献的高等院校,都应担负起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如何使本国本民族达到“文化自觉”的任务,这需要通过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长期性探索,达到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在目前急剧变迁、冲突不断的世界文化大格局的框架当中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地位,并且自觉地以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深厚底蕴来推动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的“美美与共”。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的学者们面临中西文化冲突,力求在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费孝通教授认为,当今世纪之交,在各种文化传统和政治力量激烈冲突的重要时刻,北京大学同样需要担负起类似的重任。

在这次国际学术讲座系列上,费孝通教授是第一位讲演人,他以《读马林诺斯基〈文化动态论〉的体会》为题,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于“文化自觉”的观点。这篇讲演从费教授的老师之一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动态论》(1945 年版)为出发点,叙述了这位现代社会人类学大师如何从早期提倡“桃花源式”民族志研究法开始,在晚年转入对不同文化间密切接触现象的人类学分析的历程。这一讲演与费孝通教授近年来以“学术自述与反思”为主题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构成了很强的连贯性。费孝通教授指出,马林诺斯基学术关注点的变动与 30、40 年代世界文化格局的变动息息相关,体现了这位学者对于时代问题的敏锐反应,同时也体现了当时文化接触的现

象已经初见端倪。在《文化动态论》一书中,马林诺斯基以非洲殖民文化、本土文化及两种文化的糅合形态为例,展开了对于文化研究的“三项法”的论述,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现代人类学即将面临的新使命。在费孝通教授的重新解释中,提出“三项法”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指明社会人类学惯常用来描述文化的单一性的方法在急剧变动的文化格局中已经不再适用,而社会人类学的新使命正在于促使自身学术基础的更新,以迎接新时代文化沟通的需要,在世界性的文化多元格局中寻求人文世界的求同存异。这一点,不仅对于当时的人类学是一项挑战,甚至时至今日依然值得引起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共同关注。费孝通教授以隐喻式的语调指出,不存在解决文化接触问题的现成办法,因而社会人类学者以及所有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所急需从事的工作,正是在世纪之交开拓文化理解的新视野,而在跨文化的学术思想沟通中追求人文价值的自觉,就是这一新视野的主要内涵。

三

在系列讲演与其他学术交流活动的过程中,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围绕着费孝通教授提出的论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风格各异的阐述。他们共同认为,费孝通教授所提之“文化自觉”概念,确实是21世纪到来之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面临的新使命。同时,他们也从一些独特的角度指出,获得“文化自觉”的途径可能有很多,而这些途径的开拓,依赖于对现存研究方法的重新思考。因此,在讲演的过程中,讲演者们采用了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的办法,对于跨文化沟通中常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深入的探讨。概括其主题和内容,这一系列的国际学术讲座主要是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的。

1. 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可能性

21 世纪能否实现费孝通教授所期望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求同存异与和平相处？在理论上，这首先牵涉到社会文化人类学长期以来关注的文化差异的程度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被更深一层次地界定为文化沟通可能性的问题。为此，欧洲社会人类学会会长、剑桥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斯特拉森教授(Marilyn Strathern)，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萨林斯教授(Marshall Sahlins)，英国社会人类学会会长、牛津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帕金教授(David Parkin)，英国著名人类学家、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主任布洛克教授(Maurice Bloch)分别从亲属制度、文化符号结构、认知人类学、人类学新物质论等角度，做出了深入浅出的探讨。

斯特拉森教授的讲演题目为《亲属制度的重构》。在西方社会人类学界，由于文化差异论的长期盛行，亲属关系里生育的儿女的“根”，一直被许多学者当成只在非西方社会才存在的问题。斯特拉森教授在讲演中一反过去的学术传统，而从当代西方人工受精卵和试管婴儿发明以后出现的子女“认根”之法律和权利复杂性为出发点展开。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试管婴儿在法律上是应当归属于母体，归属于拥有精子的父体，还是归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父亲”（即养父），这一系列问题无论在法律和伦理上都引起了极大关注。争端的焦点在于谁应具有对于子女的社会—法律拥有权这个问题上。这看起来是在西方某次医学技术革新后才出现的。然而，回溯到 30 年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著民族当中的人类学田野考察经验，斯特拉森教授指出，子女的社会—法律拥有权问题，在非西方社会中也存在，只不过土著人以不同的语汇来谈论这个问题罢了。表面上，“认根”问题似乎是在西方人工受精卵和试管婴儿发明以后才出现的，但事实上，它却可能是人类社会里更具普遍性的思考。从而，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似乎可以用一套来自一种文化的

语汇来取代另一种文化的语汇,例如,用西方律师的语汇来描述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著人当中的“认根争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本质上是是可以沟通的。

关于文化可沟通性的论述,向来容易受到另一派学者的反驳。而斯特拉森教授用西方法律术语来“沟通”非西方亲属制度的看法,并非是所有与会学者能够接受的。萨林斯教授在题为《什么是人类学启蒙? 20 世纪的一些教训》的讲演中指出,不同文化的内在语法能够经受住历史变动的考验而得以长时间的持续,使差异得以保存。这篇讲演涉及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为人类学家广泛运用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认为文化会随着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而趋同,甚至认为世界从近代以后已经形成一个“世界体系”。然而,人类学家在 20 世纪后期却不断发现,不同的地方文化不但没有随现代性的成长而消失,反而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复兴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向 19 世纪以来被人类学接受的“进步”和“启蒙”观念进行挑战,说明一个逆反现代性的潮流与现代性潮流一样强大,甚或冲击着现代性。那么,新时代的人类学启蒙为了什么? 萨林斯教授认为,这应当是通过研究本土文化对于现代性的吸纳以展示文化符号结构的力量来达成的事业。萨林斯教授的论述所追求的,与斯特拉森教授恰好相反:后者力图通过文化寓意的沟通来达到一种跨文化的理解,而前者则力图通过非西方文化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回应来展示文化差异。

来自英国的布洛克教授和帕金教授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再度表达了对于跨文化沟通的不同看法。布洛克教授的讲演基于他近年展开的认知人类学研究,注重儿童认知发展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人类学界的这一领域长期沉浸于文化相对主义之中,主张儿童是被动接受文化特质的主体。布洛克教授力图指出,其实儿童认识外部世界或许有着天然赋予的因素在起作用,由此我们看

到,生活在世界不同区域的儿童在某些认识方法和关注方面实际上十分相近。这或许即意味着人类确实存在普遍的共同性,而文化之间的差异或许并非人类学应该专注的惟一问题。帕金教授的讲演讨论了近年英国人类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于“物质性”(materiality)的普遍关注。他认为,这种对于物质性的关注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如对物质文化、符号景观、群体亲合性、生物力等的研究;但是,不同的研究路径却表现出对于把社会—文化局限于符号文本分析的反叛,表现出在象征、语言、解释人类学之后的一种人类学的实在论。那么,新的实在论是否代表着文化差异论的本土范式之瓦解?或者,是否代表人类学已经从 60 年代以来的分散式论述转向学科内部统一论述?帕金教授认为,一般性的人类学综合还没有出现,但这似乎应当是人类学未来发展的趋势。布洛克教授和帕金教授所讨论的并不直接是文化沟通的问题,而是具体地深入到认知人类学的普遍主义和文化具体主义的对峙当中,深入到 90 年代人类学分化与统一的对峙当中,但他们在论述上述问题时,也隐含着类似于斯特拉森教授的看法,至于这一观点能否与萨林斯教授那种强烈的文化符号结构的看法沟通起来,则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2. 社会理论的文化界限

上述四位学者的讲演表现出来的观点,无非反映了人类学这个介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的内部矛盾,而这个矛盾的实质问题在于:人类学是应当如同人文科学那样专注于被理解的文化的内涵,抑或应当如同社会科学那样,运用“实证和理论的模式”来提炼某种“规律”。如果说这个问题的阐释一直是人类学内部的“显学”,那么在社会学中它的地位则似乎不那么受重视。这次国际学术讲座系列除了邀请著名西方人类学家以外,还邀请了部分著名欧美社会学家参与。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美国社会学

家布劳教授(Peter Blau)、亚历山大教授(Jeffrey Alexander)、从事都市与组织社会学研究的法国社会学家克罗齐埃教授(Michel Crozier),以及从事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英国社会学家哈特利教授(John Hartley)及默多克教授(Graham Murdoch)等,在他们的讲演中各自介绍了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这些讲演没有像人类学家的讲演那样切近“文化自觉”和“跨文化沟通”的问题。但是,它们却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人类学者特别重视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矛盾。

美国社会学界的老前辈布劳教授在其讲演《文化与社会结构》中讨论了社会学中存在的两种对立的理论化形式,即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观察。以韦伯、帕累托、帕森斯为核心的文化理论流派,运用文化的解释学方法,力图对社会生活加以深度的理解,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而以马克思、杜尔克姆的结构理论流派,则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质。这两种方法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强调现代资本主义形成中带来的西方文化背景;而后者则认为资本主义是某种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的普遍性后果,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尽管布劳教授没有从文化与社会结构两者之间的矛盾中进一步揭示文化界限对于社会学研究的制约,但他所提供的一般性理论概述,却从一个侧面再度触及到了人类学家所关注的文化可沟通性问题。其实,以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文化理论流派和社会结构理论流派之间之所以存在差异,原因在于社会学界内部对于社会理论存在着两种态度,其中一种(文化论派)认为,以欧洲研究为中心发展出来的现代社会理论,只对于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有效;而另一种则认为,西方模式具有划时代的全球性影响,因而基于这个模式的研究提出的理论,可以在其他区域的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

以实证主义为其理论方法基础的法国社会学家克罗齐埃教授

在讲演中介绍了法国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研究的近年发展。这个讲演属于一个学科介绍性的工作,讲演者本人并未对布劳教授的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两分法做出回应,但由于过于专注于实证社会科学的方法,克罗齐埃教授给听众留下的印象是为布劳界定的结构的看法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个案。他基于法国都市生活所做出的社会学研究成果能否被运用于非西方,甚或非法国社会,或许应当成为文化论派所提的核心问题。当然,这个理论所带来的矛盾,又进一步在两位英国文化社会学家的讲演中得到重现。哈特利教授的《从权力到识别:大众新闻与后现代性》,主要论述了他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新闻、现代性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哈特利教授在讲演中强调了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和它在政治架构形成中的关键性角色。这个事实显然不只是存在于西方,在非西方社会中,大众文化似乎也已经在文化的领域中呈现出其角色的关键性。但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源自西方的文化形态,即将成为全球化的现代性政治?

默多克教授的讲演《媒体参与的现代性》用复数来描述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认为尽管大众传媒及其文化正在 20 世纪末成为世界各国文化的主流,但它是经过不同的媒体文化形式而塑造出来的,也必然带有多多样性。由于当代文化的潮流乃是社会团聚和分化的共同结果,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研究看成是对一个单一的潮流的研究。这个看法似乎又回到了萨林斯教授曾经提到过的现代性的本土化问题上去了。

以欧洲为中心提出的社会学理论是否具有普遍的适应性?这个问题在上述的几次讲演中仅仅是得到了间接的阐述。而美国社会理论研究的后起之秀亚历山大教授关于市民社会的讲演,则有意识地把这个问题提到了讲坛之上。这个讲演的主题是分析“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个概念在欧洲(或西方)话语/学术领域中

的演变。亚历山大教授认为,在一些深受非资本主义制度制约的社会中,一些政治理论家以为,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建构一个“市民社会”乃是脱离非现代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统治的惟一途径。于是,在世界各地存在着把“市民社会”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等同视之的看法。然而,考察“市民社会”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则能够发现这个概念和理想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差异性极大的内涵。尽管我们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在市民社会的空间构成中起着清除障碍的作用,但这种社会却也制造了自由和市民社会的阶级性。因此,不能把资本主义与“社会”(尤其是“市民社会”)相等同。

对源于西欧的理论加以反思,应该说是西方社会理论家的优秀传统。同样地,把一个西方式的论题相对化(通过历史的具体化和语境化),应该说这也表现出了亚历山大教授进行理论探讨的胆略。亚历山大教授未直接触及欧洲中心的理论范式的普遍适用性问题,因而他的论述可能并非人类学家所提倡的那种通过观望他者来理解自身的做法。但他对理论概念加以历史具体化的做法,却异曲同工地指出了社会理论概念具有特定历史时代和文化语境的界限,指出社会理论概念的“概念化”所可能潜含的困境。

3. 非西方国家的区域研究

社会理论的提倡者宣称,社会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论,是因为它能够经得起实证研究的考验。然而,人文学派的人类学者基本上对这个意义上的“理论”采用一种批判的看法。在他们的眼中,人类学所从事的工作,恰恰就是要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与文化理论提出经验性的反思。因此,研究的意义在于批判性的观念更新,而不在于理论的建构。然而,对于数量更多的非西方研究者而言,问题则比人文学派所提出的观点要复杂得多。除了别的问题以外,非西方社会的区域文化研究到底是服务于某种理论的延

伸,还是服务于推翻这种理论的努力,这个问题显然十分引人注目,其实质也与普遍主义和具体主义的矛盾有着某种渊源。因此,这次国际学术讲座系列的组织者特别邀请了美国的桑格瑞教授(Steven Sangren)、英国的王斯福教授(Stephan Feuchtwang)、克罗尔教授(Elisabeth Croll)、石瑞教授(Charles Stafford)、荷兰的匹克教授(Frank Pieke)以及德国的王海教授(Thomas Heberer)等长期从事中国研究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是长期致力于区域研究的学者,他们的这些经验性研究对于跨文化对话又会发挥出何种作用?

桑格瑞教授是以台湾汉人社区研究为重点的美国人类学家,在以《缘何‘文化’? 缘何‘生产’?》为主题的讲演中,他指出西方理论界对于“文化”与“生产”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曲解,力图在理论的反思中提出可供中国区域研究参考的概念体系。桑格瑞教授在讲演中特别指出,西方人类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着把“文化”与“生产”对立起来的做法,其实从古典的生产理论中我们仍然可以理解文化过程的许多方面。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当然有理由批评西方学术界对于文化的简单看法。但是,从西方学术界提出来的一些理论问题,尤其是科学风格与人文风格、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人类学界亦应引起广泛关注。!

王斯福教授的讲演《克里斯玛理论和中国生活》,与桑格瑞教授的风格有所不同,他没有从抽象理论概念出发,而是从西方基督教传统比较具体的“克里斯玛型”权威概念出发,顺着韦伯社会理论的线索,追溯并比较了人类学界对于“克里斯玛型”权威在各个非西方社会中的展现。王斯福教授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概念在韦伯一脉的社会理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在一定意义上与西方宗教体系本身的特点存在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而当西方人类学家来到中东、非洲等地区进行有关这一主题的田野考察时,他